

大学校长的演讲,要创新不要模仿

在学术和见识上,大学校长应该是各有千秋,又何必要说一些云亦云的话。在讲话中表达真我,而不是表演他人,这样的要求对一名校长来说不苛刻吧?

>>头条评论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大学毕业典礼,校长的演讲通常都是重头戏。此时,校长讲什么,又怎么讲,很能体现一个大学的水平和气质,称之为大学的一项软实力也不为过。

在高校竞争日渐激烈的环境下,大学的校长们对于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越来越重视,以至于眼下花样迭出。据

说,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了一首散文诗,更多的校长则在演讲中运用了大量的网络词语,这种“潮人潮语”的形象一举颠覆了大学校长平日端庄严谨的形象,让学生们感到新鲜和亲切。

与那些“形同公文、毫无激情、格式固定”的官样讲话相比,这种文风和姿态上的改变,确实算得上一种进步。只是,当众多高校的校长们陷入奇巧的文字游戏时,如何讨好学生、博取眼球就成

了演讲的主要目的,校长自己的见识和个性反而被淹没了。在即将踏入社会之时,大学毕业生最需要的不是校长的“插科打诨”,而是前辈对社会和人生的真知灼见。如果一个大学校长不能在毕业典礼上以真诚的语言去激励和启发学生,再多的噱头也不过是拼凑一场低级的模仿秀。

打动人的演讲的确需要活泼的表现形式,但形式不能凌驾于内容之上,只换形式不换主旨的演讲无论运

用多少时髦的形式,凡客体也好,咆哮体也罢,都是“新瓶装旧酒”。一个脱口秀演员为了娱乐听众,如此演讲并无不可,一个大学校长也这么看重表演,甚至要为此去模仿别人的风格,那么“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都是空谈。一个演讲都要模仿别人的校长恐怕也很难给学生树立创新的标杆。去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一席网络风格的演讲,获得了满堂喝彩,引得今年不少大学校长都以谈“浮云”和“伤不

起”为荣,而李培根今年另辟蹊径,又把那些喜欢人云亦云的校长们甩在了后面。

一场引起爆笑的演讲或许可以给学生们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但若千年后再回忆起这个毕业典礼,那些华丽时髦的“浮云”可能真的都成了浮云,让他们感到终身受用的一定是那些发自肺腑的嘱咐。大学校长好比学校的灵魂,他的演讲应该让学生感受到对人生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注。没有什么花言巧语能比真诚的语言更有力量。

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应邀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开篇就先告诉学生——很遗憾,今年的演讲人是个书呆子。最后,“书呆子”的演讲也获得了好评。假如大学校长能掏心掏肺地给学生一些忠告,也不用担心得不到好评。

在学术和见识上,大学校长应该是各有千秋,又何必要说一些云亦云的话。在讲话中表达真我,而不是表演他人,这样的要求对一名校长来说不苛刻吧?

>>声音

这一代年轻人没什么可抱怨的,有互联网,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委屈、想法表达出来,并引起社会的关注。青春就是很残酷,有很多第一次都在青春中产生,你要抉择和挣扎,不要因为每一代人都说青春好,你便产生幻觉,只有在回忆中的青春才是美好的。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

今天社会的激烈变化正在使得我们的言说发生深刻的转变,在一些人越来越放言无忌的同时,一些人却越来越谨慎和小心。话语一方面复杂缠绕,扭结难解,另一面却日益立场鲜明,互相壁垒森严。
——北大教授张颐武说。

当今的中国经济开发区是什么样的呢?只有经济没有社会,因为经济开发区不管地方事务,如果有一天它想起我跟农民是什么关系,它就越位了,这件事是地方政府的事,天生它就不能管社会。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津逵说。

中国的物价问题是由经济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所致。因此即使随周期因素减弱,结构转型时期的工资上涨、资源价改革、非贸易行业发展,价格仍会出现温和上涨,对此决策部门应有政策准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说。

下半年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还不说,因为目前的市场是一个政策市,你永远搞不清楚它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政策。房价是涨是跌,不完全由市场左右。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说。

中国起码需要1万个足球场,政府能提供地吗?地产商能够赞助建造吗?学校愿意开辟足球场吗?孩子他娘和学校老师能同意给孩子踢球的时间吗?
——新华社记者杨明说。

部分家长与考生对艺考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一些考生与家长认为文化课不好就学艺术,以此想投机取巧,但从近几年的录取率来看,每年的文化课录取率均比较高。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说。

“云南版王亚丽”不能只是自查自纠

公共专栏

□赵勇

河北的“骗官书记”王亚丽刚被判刑不久,“云南版王亚丽”党煦燕又冒出来了。王亚丽事发,是因为不顾一切争夺上亿财产;“云南版王亚丽”现形,来自网上的举报,都有相当的偶然性。

身份、年龄、履历、档案……除了性别,王亚丽几乎无一不假。同样,党煦燕涉嫌履历造假,也是网友举报的焦点。但党煦燕的升迁速度显然比王亚丽还要惊人——2004年至2007年7月,从借用人员提升为昆明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助理、副局长、局长,然后是昆明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副主任……三年提四级,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到如今拟任副厅级的中国贸促会云南省分会副会长,如此神话,连昆明市委组织部部长郭红波都直言“不太合常规”——按规定,下一职级提升到上一职级副级,最少需要3年,同职级从副转正最少要2年。

那么,党煦燕的升迁神话背后到底有多少猫腻?一个小细节已经能说明问题。《新京报》7月6日的调查称,针对党煦燕曾任“河南中原贸易公司”海外高管的履历,该报记者在河南省工商局官网检索,在企业查询、吊销查询和注销查询资料库中,均未发现有“河南中原贸易公司”的任何信息,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网友们关于党煦燕伪造履历的质疑。

再来看看党煦燕的发迹史,就更如荒诞小说般离奇。网上的举报材料称:党煦燕原系社会闲散人员,2000年时没有工作。后托人介绍,高新区一位管人事的领导看她“带个小孩可怜”,把她招到国资公司打工。2002年,借聘到管委会下属的国资公司,2003年借到管委会工作,“开始飞黄腾达”。

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都这么难,党煦燕真是买彩票中大奖的命——只因为“带

个小孩可怜”,就谋得了国资公司的好工作,之后更是一路通达、扶摇直上,一路上,党煦燕想必遇到了不少贵人,简直犹如一路买彩一路中大奖。这些乐于助人的贵人都是谁呢?真是一个极大的悬念。至少在我,就想知道那个看到人家“带个小孩可怜”的高新区领导是谁,现在很多人连扶个老大都要考虑半天,这么古道热肠的人,真不多了,不挖掘出来当个典型,太可惜了。

党煦燕的事情,已经引起了重视,所以正在调查中,但老实说,调查能不能给出真相,仍然是让人心存疑虑的。很明显,在党煦燕的提拔过程中,诸如“超常规升迁”这样的反常现象,早已是明摆着的事情,当时没“查”出来,现在即便网友抖出来了,仍然是可以找到各种理由把破洞堵上的——一句“不拘一格降人才”,貌似就可以堵住悠悠众口了。其他的诸如网友举报的履历造假问题,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审核”出来?这么明显的谎言,记者查一下工商资料就能搞明白,为什么审核人事资料的部门查不出来?是不是有神通广大者早已帮党煦燕打通了关节、铺好了路子?

党煦燕一路火箭般升迁,其中问题重重,却可以一辨即明。如果负责审核其人事资料的部门当初已经习惯性失明,那么,现在大家又凭什么相信他们会给出个说法?即便最后有了说法,谁又能保证不是大事化小?如果想给出有足够公信力的调查结果,相关部门就应该避嫌,将此事交由中央有关部门查处——“骗官书记”王亚丽最后落马,就是因为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如果将此事完全交由当地调查,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官员在捂盖子的过程中成为党煦燕的利益共同体,这将为上级的调查取证增加相当大的阻力,也会令真相浮出水面变得更加艰难。以此看来,“云南版王亚丽”背后的利益链与真相何时能浮现,正取决于中央专案组什么时候开始介入调查——快,则事态可控;慢,则结局难料。

>>众论

别在为溢油瞒报找借口了

国家海洋局5日通报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此前社会上对溢油信息不公开已沸反盈天,而国家海洋局解释,曾建议康菲公司披露信息,但他们没有照办;这次溢油原因复杂,监测数据的采集、污染面积的判断、事故原因的分析等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准确结论,所以国家海洋局通报迟了。(7月6日《新京报》)

肇事公司不披露信息,知情的政府部门没找到事故原因,于是“通报”就迟了,要等到溢油发生半个月后,公众才大吃一惊地听到“谣传”。按照国家海洋局的逻辑,日本政府对福岛核泄漏似乎也可以先捂着,因为核泄漏比溢油更复杂,“监测数据的采集、污染面积的判断、事故原因的分析”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披

露信息只好待之将来。分析事故原因之类,其实只是信息不公开的中国式理由。

海上溢油,污染海洋环境,危及海洋生态,往小处说,涉及渔民、海产养殖企业的权利;往大处说,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有权知道溢油事故,而且是及时知情。知情的价值,一是如果权利受损,可以主张权利;二是及时规避事故可能造成危害。事故原因,公众自然想了解,但知道事故的发生本身最关键。事故原因要调查,但分析、调查事故原因不是信息不公开的理由。

捂着事故消息,侥幸的话可以悄悄把事故处理掉,但局面也有可能变得不可收拾。信息公开,于企业可谓明智,对政府来说则别无选择。
(杨于洋)

维护高温权益不能止步于“提醒”

国家安监总局办公厅等部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用人单位防暑降温工作的监督检查,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夏季防暑降温费、高温津贴支付等情形的监督检查。由国家安监总局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及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发出的这份通知要求,督促指导用人单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7月6日《京华时报》)

依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劳动者拥有六大高温权益,但

是,在制度落实过程中,这些原本劳动者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几乎变成了一纸空文。至于劳动者高温权益被架空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会和劳动保障部门执法软弱,因为我们在每年高温季节,总是听到工会和劳动保障部门的声音,但无一例外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善意“提醒”,让充满期待的六大高温权益沦为“提醒”,而不能仅止步于“提醒”,而在于严格公正执法。唯此,高温下的权益,劳动者才能拿到手。
(吴睿鹤)

应怎么看待退休高官的“旋转门”

>>个论

□彭兴庭

在中国内地市值排名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其中不乏副部级以上高官。调查称,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前官员总数达1599人,其中467人在上市公司的职务是独立董事。有专家指出,企业聘请官员并不看重其“工作能力”,其用意和目的只能意会。(人民网7月5日)

退休高官到企业当高管、做顾问,这种“颐养天年”的方式,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其实都司空见惯。在日本,就有一个惯例,金融当局的官员退休后可以到民间银行部门担任要

职,这就是所谓的“下凡”现象,通过这种方式,以往清贫的官僚可以获得高额报酬和退休金。而在美国,政府高官和商界高管之间的角色转换更是稀松平常,以至于有了一个专门的术语来形容,即“旋转门”。

美国审计署曾发布一份报告,2004年至2006年两年间,共有2435名前五角大楼官员被52家防务承包商聘用,其中7家大型公司聘用的人数就达1581人,报告估计至少有422人从军界进入企业界之后,与从前所在部门有业务往来。此外,在国会,有40%的离退职国会议员在过了法定的回避期后进入了游说公司,摇身一变成说客。当然,美国“旋转门”中最引人注目莫过于美国总统,他们除了写自传,忙演讲,出席商业活动之

外,另一个吸金的途径,就是担任各大财团的顾问。

很奇怪的是,美国大多数民众对“旋转门”似乎并不排斥。财发够了,到政府部门过过瘾,不想当了,就下海捞钱,这些角色转换似乎也切合美国的自由主义精神。当然,这并不表示美国的“旋转门”没有问题,转出麻烦,转出腐败,也一直是美国民众热议的话题。不过,美国的法律和制度也一直在成熟当中。从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开始,对“旋转门”可能造成的利益冲突和腐败问题,美国司法就开始了严格的限制。比如,对前政府官员从事游说、谈判等活动设置1年、2年、5年或终身不等的冷却期等等。

官员离职后能够甘于寂寞,养养花,种种草,或者写写回忆录,“卒老于文字之间”,这

种精神固然可贵。但是,谁也不能阻挡他们“发挥余热”的自由。对于退休高官的“旋转门”,借鉴国外的经验,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规范。

第一,加强对高官卸后权力的消磁。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第102条,“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这应该算是我国关于“旋转门”的限制条款了。但是,这一条款到目前为止,仍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而且,责令改正、清退、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措施显然太轻,再加上官员财产不公开、执法机制不完善等等,《公务员法》第102条基本流于形式。

第二,降低高级官员的任期,增强流动性。腐败的重要条件是关系网,而这需要长期的积累过程。在中国,现在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官僚阶层的日益固化,比如,高级官员选任的终身化、长期化,无疑为腐败及权力的期权化大开了方便之门。官员的流动,不仅仅是官向商、官向学的转化,也包括商界、学界向政府部门的职位转换。以美国为例,除联邦法官外,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就任时间平均不到2年。一朝天子一朝臣,高级官员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了建立“熟人网”的可能性。人一走,茶就凉,即使官员引退后进入企业,企业看重的也是他的经验,而不是人脉。

■本版投稿邮箱:
zhangjinling@qlwb.com.cn